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傅斯年

卷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史学方法导论
夷夏东西说
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 著
欧阳哲生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Z126/29

:11

2009

大家国学

傅斯年

卷

傅斯年 著
欧阳哲生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傅斯年 / 傅斯年著; 欧阳哲生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2

ISBN 978 - 7 - 201 - 06132 - 0

I. 大… II. ①傅… ②欧…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3599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 之

大家国学·傅斯年

作 者 傅斯年

编 者 欧阳哲生

丛书编辑 曾 羽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吴春艳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cn>

邮 箱 tjrmcb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1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6132 - 0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 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 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

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由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国学”的热潮正在席卷中国学术界。在这个时刻,我以为重温傅斯年当年不同于“国粹派”的“国学观”,似有必要。至少它提醒我们在“国学”研究中应该注意防止某些可能发生的偏向。

“国学”本意为中国之学或本国学术,这一词的使用最初应是针对外国学术或西洋学术而言。近代以后,由于西学的大量输入,作为与之对立的“中学”随之被人们频繁地使用,19世纪下半期,围绕“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洋务派、维新派都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经过一番讨论后所形成的主流意见或经官方认定的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挫辱,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难境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在文化领域兴起一股“国粹派”势力,他们受启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古学复兴”,提倡挖掘“国粹”,以激励种性。作为“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如是解释他们的宗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①“国粹派”以《国粹学报》为核心阵地,在上海设立国学保存会,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讲国学,倡国粹蔚然成风。这种学风俨然成为一派——章太炎派,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一股势力。民国初年,

^①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章太炎的弟子陆续北上进入北大，取代原在京师大学堂占主导地位的同城派，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可见其力量之盛。从历史的角度看，“国粹派”提倡研究国学，讲求文字训诂，在学术上自有其地位。但随着新旧文化替换的急速进行，“国粹派”逐渐也显示出其过时的老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的挑战，也隐含包含着对以章太炎为精神灵魂的“国粹派”的超越。胡适撰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即在学术上对章太炎的一次挑战。五四时期，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作的识语中明确表达了不同于“国粹派”的意见，也是在“章太炎派”外别树一帜。傅斯年提出自己“想做篇《国故论》，大旨是：(1)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2)所以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3)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运命和盘托出了。”“(4)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5)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①这五条意见，条条都是针对“国粹派”而发，反对“追摹国故”，提出“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讥讽“保存国粹”不成一名词，提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输入新知”比“研究国故”更为重要，极为鲜明地表现了新文化派对“国粹派”不屑的态度。这是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中第一次明确反对“国粹派”的立场，实际

① 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上也是他与章太炎派决裂的开始。

一九二〇年以后,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以后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浸泡于西方学术之中,使他对现代科学的科学性有了更深的体验。这些新的学术经验,在他留学时期与胡适、顾颉刚的通信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先后执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以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在学术上的行政才干和躬行自己的学术理想。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建设新的历史学的基本构想和思路,其中不乏对过时的“国粹派”和新近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这就实际上要求新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划清自己与“国粹派”、“国学院”甚至“整理国故”这些带“国”字号的学派、学术机构和学术运动的界限,将对 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世界视域之中。

在《旨趣》中,傅斯年表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须注意吸收西方学者的长处。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等人文学科领域,傅斯年提醒人们,西方学者表现出许多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专长,如重视挖掘和使用地下考古材料、文物材料,重视研究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

人开头为有规模的注意。”“如希拉艺术如何影响中国佛教艺术,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成分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物事,中国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来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值得效法和借鉴的。换句话说,被我们称之为“国学”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研究,其实也并不完全为我们国人所专有,西方学者由于具备近代科学的眼光,在治学上亦有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地方。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喊出了三句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那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这是傅斯年对史语所同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国学”观。以这样一种观念为约规,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真正突破了传统的“仁义礼智”的儒家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性质,并在世界视域内与欧美、日本同行展开学术竞争,中国历史学、语言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傅斯年的“国学”观是科学的“国学”观,是要求具备世界眼光的“国学”观,这种新的“国学”观虽仍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我们思考拓展国学研究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傅斯年的治学范围甚广,其成就涉及中国上古史、明清史、哲学史、文学史、《史记》研究、东北史研究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字,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性命古训辨证》,它们不仅被他本人视为代表作,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根据傅斯年的这种学术布

局,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有一基本的了解。

欧阳哲生

目 录

总 序/1

前 言/1

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3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5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13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40

史学方法导论/50

史料论略/51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

论所谓五等爵/93

姜原/115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123

夷夏东西说/133

周东封与殷遗民/183

性命古训辨证

序/194

2 大家国学·傅斯年

引语/197

上卷释字/202

中卷释义/259

下卷释绪/334

大家国学·傅斯年

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两三个月以前,我就想做篇《国故论》,大旨是:

(1)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彩色——如梵文的发明,使得欧洲言语学上得个新生命,婆罗门经典入欧洲,便有叔本华派的哲学,澳洲生物界的发明,进化论的原理上得些切实的证据等等——亦未可知。我不是说中华国故里面有若干完全的系统,为近代欧洲所不及的;我是说中华国故里面或者有几项可以提醒我们(Suggestions)。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

(2)所以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

(3)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